

張豈之 著

儒學・理學・實學・新學



儒學・理學・實學・新學

● 張豈之 著

陝西人民出版社

儒学·理学·实学·新学

张岂之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印张 5插页 272千字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224-01743-4/B·29

定价：10.30 元

古之精华例举（代序）

在这本《儒学·理学·实学·新学》的关于中国思想文化的论集中，我选择了自己所写论文的一部分，并在最近几乎都作了修改和补充，大体上能表达我对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些粗浅的看法。尽管论文有不少过去发表过，是零散的，没有构成一个整体，在论点的锤炼和论证上还缺少应有的推敲功夫，但这次编选成书过程中，我把应当做而过去未做的，都补了一课，请专家学者和读者同志们指正。

若干年来，在关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学术讨论中，学者们很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究竟有哪些能称得上是“精华”的？关于此问题，有许多观点。比如，觉得将思想文化划分为糟粕和精华的所谓两分法，又很难加以区分；又如，从某一方面看是精华，而从另外一方面看却又是糟粕，等等。这说明区分思想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是非常复杂的事，不能简单从事。思想文化中存在着积极的和消极的，优点和缺点，精华和糟粕等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并非人的主观臆造。一个

国家和民族在长期历史实践中所创造出的思想文化，不可能全部是漆黑一团，也不可能全部是珍品，这就需要研究、分解、选择，使优点发扬，劣点缩小其影响。尽管这是一项复杂的精神工程，但需要有人去做。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进行研究，开展讨论，积以时日，是会取得积极成果的。

凡是人类创造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可以包含于“文化”概念中，而思想则是文化的核心，因为任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都离不开一定思想的直接或间接的指导和影响。所以，从思想史角度探讨传统文化，比较容易收到应有的效果。

许多学者们力求将中国思想文化的特色从理论上加以归纳，我读了他们的著作和论文，受到不少启发。关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华，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加以理论分析，也是很宝贵的学术见解。不过，我觉得要用一两句话来概括中国思想文化的精华，似乎有些困难。我的浅见是：“人学”、“自然”之学、“有对”之学，以及“会通”之学，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精华的若干方面。

关于儒家的“人学”，我在这本论集中有多篇论文作了较仔细的分析，供读者同志们参考，这里从略。

当然，中国思想文化并不限于儒学。古代的中国有许多重要的学派，他们都对中国思想文化作出了贡献。道家的“自然”之学，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理论思维资

料，充分显示出中华民族是具有丰富理论思维的民族。在这本论集中，我没有专门论述这方面的论文，请允许我在这里多写几句。

首先，道家“自然”之学力求探讨世界的本原和本质。道家经典《老子》一书是中国古代哲学智慧的结晶之一。它开宗明义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些显然不是随感而发，而是总结了老子以前人们对于世界的思索和探求而产生的理论概括。这里“道”与“常道”，“名”与“无名”，“常无”与“常有”等等对立范畴，标志着古代哲人力求从现象世界迈进本质世界，从现象世界中观察到事物的生成与消灭，进而探求这些流动变化的原因。“无名”作为天地的始原，“有名”作为万物的本根，虽然是借用的名词代号，但它们又是外延极大的名词，后代任何科学上的发现，如要从哲学上加以概括，都超越不了“有”与“无”的外延限定。

我国古代的哲人根据对自然运行的观察和沉思，他们洞察到世界是无限的不断运动的“物”（代词），它不是祖先神，不是人的意志，不是神与鬼，正如《老子》第二十五章用诗一样的语言所写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天。

……”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认为天、地、人都是自然而然地从“道”那里产生；道和天、地、人自然而然地循环运行，永不停顿。这种自然哲学的出现标志着中华民族是以一个哲学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当然，先哲们对于世界的思索，不可能每句话、每个理论概括都是那样准确无误。正如一个健步如飞的成人不应当嘲笑自己幼年学步时的情景一样。我们今天所拥有的科学知识，未尝不是由于古代哲人们为我们奠定了认识的基础。

其次，“自然”之学提出了重要的哲学问题。战国中期道家代表人物庄子发现，世间事物都是相对的。你看：北海有鱼，化而为鸟，名叫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庄子·逍遥游》）。还有另一种情况，蝉和小鸠只能飞几步，可是它们嘲笑大鹏为何要飞九万里到南海去呢！再说，有些生物，如朝菌、寒蝉，生命短促，而楚国南方的灵龟，却以五百年为春，五百年为秋。远古时期的大椿树以八千年为春，八千年为秋。这些现象应当如何解释？作为万物之灵的“人”能否超越种种“相对”而获得自由？庄子提出了哲学上的重要问题。

庄子不能正确地解决困扰他的哲学问题。他用想象代替科学，用诗歌代替哲学。他想超越“相对”，用他的话说就是：“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同上）在他看来，依

据天地自然规则，驾驭六气变化，进入无限空间，这样即可超越“相对”而获得自由。他不懂得绝对寓于相对之中，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等科学真理；他给我们留下了诗，留下了机智的哲学问题，可是他的答案是不正确的。

不能不提到，“自然”之学强调顺应自然之理而行事。《庄子·养生主》中关于庖丁解牛一段，对此作了透彻的论述。庖丁为文惠君解牛，其高超的技术已至绝境。他动刀的声音和《桑林》乐章的舞步，和《经首》乐章的韵律。据庖丁自己说，他“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枝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辄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可见庖丁在长期解牛实践中，对牛体的纹理、结构，已经了若指掌。他顺着牛体的纹路去动刀，不致砍到骨头上，却在骨节的缝隙间很自然地支解了牛的躯体。将庖丁解牛的故事引申开来，就是要随着自然法则来待人处世。所谓“依乎天理”、“因其故然”，就是这个道理的哲学概括。

总之，道家的“自然”之学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思维资料，只要取舍得当，它可以启发我们思考许多问题。

有些学者曾经提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主干，究竟是儒学，还是道家学说？对此问题我没有研究，不敢发表意见，但我认为，中国古代各个重要的学派都是相

互吸收，相互容纳的。在这本论文集中，有一篇关于中国古代大国思想的短文附条，其中就提到，《礼记·礼运篇》的“大国”理想实际是儒学、墨学和道家学说的相互结合。

我还想提到，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有对”之学，即辩证思维，也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的“有对”之学，反对片面性，主张全面性。“有对”之学关于忧患与安乐（安乐中不忘忧患，忧患中不忘安乐，防微杜渐，居安思危，免得事物向坏的方面转化）；情与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才有说服力，将情与理结合起来）；学与思（学习与思考相统一）；知与行（认识与行动相统一）等等方面辩证统一观，成为古代辩证思维的辉煌一页。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有对”之学，并非纯哲学理论，它更加着重于运用，即运用于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成就辉煌卓著。于是，在历史的长期演变发展中，逐渐形成这样的看法，要使事业成功，必须学习和运用中国的“有对”之学，甚至外国的学者与事业家们对此也有认识。如《三国演义》中关于“有对”之学的运用，在日本被奉为“事业成功之道”。不仅如此，当今世界上有些国家孜孜不倦地研究《孙子兵法》十三篇，也就是具体地学习中国古代“有对”之学。《孙子兵法》是“有对”之学运用于军事和人事的范本。其作者相传为春秋末年齐国人孙武。据

《史记》载，孙武任吴王阖闾的大将，指挥吴军战胜楚国。他的后裔孙臆继承其军事思想，曾任齐军师，击败魏国。今本《孙子兵法》带有战国时代色彩，可能经过孙臆的整理修改。

《孙子兵法》论述战略和战术思想时，对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之论述，对政治与军事相互关系之论述，对分析与综合相统一之论述，关于人依据客观条件发挥主观能动性论述，关于如何扬己之长、克己之短之论述，等等，使这部著作成为中国古代“有对”之学的百科全书，其理论活力至今不衰。

如果说中国先秦时期是“有对”之学的高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宋、明时期则又是另一高峰。宋明理学不仅继承和阐发了以前“有对”之学，而且吸取并改造了佛学的辩证思维。因此，宋明时期“有对”之学在“分”与“合”关系的理论阐述方面作出了贡献。如北宋时期邵雍提出“一分为二”，他说：“……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合之斯为一，衍之斯为万。”

（《观物外篇》）这还只是数学上的一分为二，包含有辩证因素，还不能完全等同于辩证的一分为二。再如张载提出“一物两体”论，他说：“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二故化。此天地之所以参也。”（《正蒙·参两》）这就表述了事物矛盾即对立又统一。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不但论述动与静、阴与阳、生与死、始与终的对立

统一，而且猜测到“对立”的两方面不是平衡的，其中有一方占主导地位。他说，动与静互根，然而动却是主导面。这个观点后来在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著作中得到发展。

不过，中国古代“有对”学说未能解决何以万物有对、何以物极必反、何以两体中有一体占主导地位等问题。尽管如此，“有对”之学毫无疑问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精华部分。

最后，还想提到，“会通”之学也表现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特色。

中国先秦时期有许多学派，学派间相互辩论又相互吸收，共同发展。如果说春秋时代文化中心偏于邹、鲁，则战国时代的文化已无此种界限，文化的交流日益开展起来。如荀子虽出身于儒家，尊崇孔子的传统，但正如清初学者傅山所说，其思想“近于法家，近于刑名家”，而且在一些论点上，又有“近于墨家者言”。

（《荀子评注》手稿）荀子广泛吸取了各家的思想精华，同时对各个学派，包括儒家的若干派别在内，都作了深刻的批评。再如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也带有“会通”之学的特色，它企图综合相互矛盾的各家学说，这即是所谓的“杂家”。

中国文化善于吸收外来文化。佛学最初传入中国时，就产生了“格义”之学，用来沟通当时流行的玄学和佛学原理。在这之后，佛经的传译逐渐繁荣起来，在

中国形成了许多佛学宗派，它们具有中国特色而不纯为印度佛学。佛学被改造而融汇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中国古代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首先，佛学丰富了中国哲学范畴。唐、宋朝时期中国哲学范畴之丰富远远超过以往，这是因为佛学的一些范畴（如“能”、“所”、“太虚”、“识”、“相”等等）被纳入中国哲学，使它丰富起来。

同时，佛学将中国思想中的主体意识论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唐代禅宗六祖慧能所谓“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四句偈，已反映出禅学乃是宗教化的主体意识论。它从本体论、认识论、道德论、时空论诸方面阐述主体意识的作用，在不少地方将人的认识的一个方面绝对化、直线化，但同时也留下了比较丰富的关于生与死、相对与绝对、整体与分别、暂时与永恒等对立范畴的关系，以及与人的主体意识之联系等方面的思想资料，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涵，又引发新的哲学流派（如陆、王心学）。清朝初年一些思想家受其影响，吸取其合理因素，又加以匡正和改造，丰富了学术思想。

清初的一大批学者，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都有精湛的研究，他们的思想学说大都可称之为“会通”之学。他们具有渊博的学识，纵论古今上下文化遗产，从政教风俗到自然科学，从哲学到历史、地理，从儒家经典到释、老之说，无不有所论述。如方以智对诸子百家

有许多精辟的评论，同时又对儒、佛、道思想给以批评和改造，既有舍弃，又有“择善”（方氏用语，指择取其精华）。

以上我从四个方面简要论述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精华，不过，这仅仅是举例，还不是全面论述。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不可能抛弃古代思想文化传统，但也不能全部继承。所要继承的是其优良的方面，所要抛弃的则是陈腐方面。继承不是原封不动地搬来，须加以改造和发展，使它与现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吻合。只有这样，古代思想文化的精华才能永葆青春，成为人民的精神财富。

了解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精华，并加以吸取和改造，最主要的效用是它可以提高我们全民族的素质，提高全民的文化水平和思想水平。这种影响和教育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不同于提出一张设计蓝图，按此加以施工，不久即可看到一幢建筑矗立起来。正因为如此，关于古代思想文化的研究，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由于多种原因，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精华并未在民间普及，当然更谈不上生根。因此许多学者为中华民族的美德有被淡化的危险而大声疾呼。为此，对古代思想文化进行研究、分解，吸收并改造其精华，在人民中间坚持不懈地加以介绍和宣传，弘扬祖国优秀文化，使民族美德和古代理论思维的真理的粒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

我国是一个有11亿多人口的大国，需要强大的精神凝聚力，需要大力宣传爱国主义。这些都要依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传统”既包括古，也包括今）中的精华相结合。只有这样，民族的凝聚力才有“根”，只有这样，爱国主义才有深厚的基础。依据本文前面所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关于做人的道理、关于积极探求自然的精神、关于全面分析问题的方法、关于广泛研究吸取各种学问的气度，都值得我们批判地加以继承。

我就提出这么一些意见，作为这本论集的序言吧。不妥处，敬请读者同志们批评指正。

目 录

儒 学 篇

论儒学“人学”思想体系·····	(3)
关于儒学传统道德的若干理论问题·····	(19)
论儒学的理性自觉与独断主义·····	(37)
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特点·····	(49)
论孔子“和而不同”的文化观·····	(68)
关于《礼记·礼运篇》的“大同”理想·····	(77)

理 学 篇

关于编著《宋明理学史》的通信·····	(83)
第一封信：我们的学术责任·····	(83)
第二封信：关于我国台湾学者和日本学者研究理 学的一些著作·····	(88)
第三封信：关于理学与关学·····	(98)
二程怎样将经学改造为理学？·····	(106)
从理学到实学的一个重要环节——罗钦顺思想·····	(115)
论理学到实学过渡的理论环节——戴山学派·····	(145)

实 学 篇

简释“实学”	(165)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的理论贡献	
——王夫之对《易》学的改造	(168)
评王夫之的历史观	(193)
《明夷待访录》与实学	(210)
顾炎武与“实学”	(223)

新 学 篇

论中国近代哲学	(263)
严复怎样介绍西学?	(281)
孙中山关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评论	(307)
关于中国近代伦理思想问题	(326)
辛亥革命时期伦理思想和人生价值观的新课题	(339)
“五四”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354)

治 学 篇

论思想史与哲学史的相互关系	(373)
关于提高思想史研究水平的对话	(384)
加强理论思维锻炼	(393)
关于思想史研究的两点建议	(397)
侯外庐先生思想史研究的卓越贡献	(404)
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园地里耕耘	(414)
侯外庐赞扬白寿彝先生的治学精神	(428)

忆从汤先生学习西方哲学史·····	(439)
治学小议·····	(450)
后记·····	(461)